

2014年为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年,中日双方都举办了各种学术活动,出版了很多书籍、论文、电影与电视剧,其中也不乏稀见的揭密史料,引人关注。这段时间笔者与各位编者正在日任教、留学,感到两国立场虽有不同,但有一些史料却都被忽略了。其中最让我们关注的就是战争前后在日本出现的大量的汉诗文。

我们访问了马关条约签订处下关市的春帆楼,在翻检参战者留存的文稿以及当时各类报刊汉诗文后,感慨甚多。日本史家多以此事作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标志,并视此为日本现代国民意识崛起的一个动源,下关各处有关甲午战争(日清战争)遗迹多存有明治人物的颂碑。于中国而言,甲午战争是近代国耻之极,战争的结果充分暴露了专制王朝的腐朽与无能,直接催生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兴起。战争之初,无论是海上舰队还是岸基炮群,清朝实力并不在日军之下,很多军官与日军一样都曾在英国受过训,总体财力也在日本之上,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海陆全败,多年经营的洋务军备也丧失殆尽。战前七年(1886年),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定远号、镇远号到长崎炫示武力,然而愚昧的自大、涣散的军纪,既暴露自身的落后,又激起了日本人奋起直追的疯狂。长崎事件后,日本上至天皇下到商贩,全民捐款造舰,仅用了六年,舰队总吨位就赶超了北洋舰队,而且新购之舰性能多是

《甲午日本汉诗选录》编后记

■查屏球



《甲午日本汉诗选录》(上、下)
查屏球编著
凤凰出版社出版

后来居上。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有识者如何呼吁,清廷不仅未加一首新舰,而且还削减海军经费,连正常训练都难保证,多年未发一炮。很多待在现代军舰上的官兵,无现代科技观念,设备管理失序,临战全无章法。结果旅顺港最现代的岸防炮反被日军夺得用来炮击刘公岛的北洋舰队,远东最大的战舰定远号自爆,镇远号还被日军掳去。甲午完败的结局表明政治体制的顽疾,不是坚船利炮能够解决的,腐朽的制度才是国防最弱的地方。师夷之长,如果只取形式上的枪炮之长是无法制夷的。中日两国在向近代文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碰撞即体现这一点。而这一点在当时日本汉诗文中多有所表现,虽然,这些汉诗文多有蔑清之论,体现了窥视者因发现猎食对象弱点后产生的自信与贪婪,但也从另一层面暴露了清廷政治的落后,这对于我们总结这一段历史也是有参考意义的。因此,我们在清理这部分文献时,虽多有国殇之痛与被辱之愤,但也时时太息扼腕。如在这些诗中有多首吊悼丁汝昌的诗,其不惜一死而守节的壮志感染了对手,使他们对这一败军之将多存敬意。但是,其时清廷上下却将战

败全部归罪于这位前方将领,并由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两下对照,反差甚大。揭开伤疤确让人痛,但可让人深度了解致伤的原因,总结教训。

十九世纪末,随着西人殖民扩张的加大,中日两国都被推到了近代化门口,由于两国所走路不同,近代化的步伐不一,结果大异。中国的渐进式变化终被日本突变式的发展超越,东亚政治版图与文化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在输入中国文化一千多年后,儒家化社会意识在日本已本土化了,明治政治人物多以儒家“修齐

治平”的理念来推动日本近代化的转制,在其成功之后,又以华夷之辨来诠释西方的文明进化论。自明清易代之后,日本对清廷就存有轻蔑之意,视其为夷狄胡虏,这一时期,物质文明优势使其更加放大了这一意识,进而反客为主,以文明中心自居,为其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进行包装。在这些汉诗中,多赤裸裸地表现了这一侵略意识,同时它们也表明,随着“中华帝国”在东亚中心地位的沦落,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的诠释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走向。这一时期的东亚,出现了一种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借助现代交通与传媒工具,中、日、韩三国文人的交往与交流空前频繁,日本学人对中国文化开始有了抵近观察与体验的机会;另一方面,侵略与反抗的矛盾也有了从未有过的激烈,对某些日本文人来说,陶然于学与侵占经略之心是并存的。这种因战事而生的文化交流,其复杂性尚有待于文化学者的近一步研究,仅贴上“友好”或“侵略”的标签,实失之简单化。从这一角度看,今天,将之搜辑整理出来方便研究者使用,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可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文化运转的一个具体史实,可避免因

强调某一方面的因素,脱离历史背景而误解了相关文献。

早在2006年笔者即有编纂这类资料的想法,累年难成,幸遇志趣相投的一批好学之士,终得以成。这是一次愉快而有效的合作,录下拙诗《留别九大留学诸君》一诗以资记忆:

鸿飞萍聚人生事,心印相通万里思。最忆春帆登览处,难忘秋瑾痛伤诗。东洋卅载风涛谷,吾土三朝腐俗池。血火未消师弟转,发袍初革上下疑。喊呐开悟医民性,神女惊知铸血辞。逐汉千年朝夕速,超倭十纪卯寅迟。西乡面壁身残日,庆应习兰衣冷时。南海老狂多暮气,少年中国望君持。

注:
春帆楼,在山口县下关市,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此处订议《马关条约》。藩县改制前此地属长洲藩,幕末维新之杰如高杉晋作、木户孝永、山县有朋、陆奥宗光、伊藤博文等多出于此。1865年,二十四岁的高杉晋作于此举兵,开倒幕之序。此地维新遗迹甚多,“日清议和处”即是其中之一,“李鸿章登岸”、“李鸿章宿馆”、“李鸿章受伤”、“李鸿章小路”皆设路牌昭示,楼内外多有日本名流题诗碑迹。

三朝,指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

西乡、庆应,分指西乡隆盛、福泽谕吉,前者因斗武而臂残,后者创建庆应义塾大学,少时多贫。

兰,江户时代日本称西学为兰学,指荷兰人传来的学问。

文学社会学的“摆渡”

■罗时进

中国古代诗文,从先秦到唐宋是各种文体的萌生、成长、形成阶段;明清诗文自然也有成长,甚至出现显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与回溯、总结相伴的。也正因为如此,诗文二体迄于唐宋,内部结构方面的问题很多,而至明清则外部关系问题更加突出。虽然,几乎所有称之为“外部关系”方面的问题在唐宋乃至先唐时代都有,但显然不如明清时代那样全面集中、高度呈现,这不免使人好奇。而正如文学内部结构具有相关性一样,外部关系问题之丛生往往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链式的,一是树形的。前者是问题套连着问题,后者是主要问题旁生出诸多问题。这种复杂状态尤其能够激发出研究兴趣。因为,如欲抵达明清诗文的本真,理解其文人、文心、文本之感人处,不将诸多“外部”关系梳理清楚,会多少有些隔靴搔痒。

这也就是自己这些年在明清诗文研究方面比较侧重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主要原因了。但文学社会学是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我们知道,文学同时属于个人智慧、文本形式和社会结构这三个领域,从任何一个领域出发,都可能抵达文学世界。不过应该承认,这三者与文学世界不是等距离的,而文学社会学研究较之其他方法更容易发生偏差,罗贝尔·埃斯卡皮在写作《文学与社会》时已经注意到相关问题:

真正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明显地被忽略了,即使在按照传统方法编写得最好的文学史教材中也是如此。有时候作

者意识到了社会维数,并试图加以描述,可是,由于缺乏严谨的、专门的方法,因而他们还是经常当了人与作品这个传统框架的俘虏。历史的深度仿佛在一块二维屏幕上被压扁了;文学事实因此受到扭曲,就同一张世界地图在平面投影上的失真情况一模一样。

这里,埃斯卡皮“社会学角度的研究明显被忽略”,“文学事实因此受到扭曲”之说,是就文学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而言的,是一个学术层面的问题,而在我们的文学研究实践中,自不免将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学事实“扭曲”,其中既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

在1950年代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社会学是学者们最习惯使用的方法,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的“知人论世”说的影响,一方面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知人论世的理念本来很好,是理性而科学性的,也是感性而人文化的,但因为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变得图式化、标签化、简单化了,文学社会学的理论意义也随之耗散殆尽。新时期初人们一梦醒来时,它不可避免地获得了一个“庸俗社会学”的恶谥,以至于有学者明确声明:“什么方法都好,就是不能容忍社会学方法。”尽管不断有学者将文学社会学与其他国外文艺理论、方法并论加以介绍,为其科学性、可行性辩护,但似乎总难洗白。在研究过程中,许多研究者的课题高度接近甚或深度切入了文学社会学之要义,却仍然回避这一命名。

命名或可回避,但文学发展的史实无

可回避。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行为除了自我抒情,同时也是一种交际行为的话,那么就on置其交往实践于不顾;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家的想象与历史与现实有关,文学作品与作者生存环境中的社会结构具有某种同源性的话,那么就不应无视历史渊源与社会结构;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生产物品,只有在传播、流转中才能实现其价值的话,那么就不可忽略其生产与传播的过程。

其实,这些问题,对文学创作来说,也很难说皆属“外部关系”,而与“内部结构”无关。文学的“外部”与“内部”有时并不是那么畛域分明的。也就是说,即使着眼于文学的“内部”研究,也应该容忍社会学方法,甚至必须适当地加以运用。

说到底,这算不上什么理论与方法的自觉,而是一种“船到桥头”的自然取向。

研究实践与命名的脱节,还与强调文学学科的主体性有关。自从文学社会学在欧洲成为一个学派并产生了影响后,他们的一些社会学著作中便往往堂皇地将其作为内容设定了,使社会学的疆域得到拓宽。虽然对这一学科发展思路无可置喙,但也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文学社会学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社会学研究的范畴?

其实,随着学科壁垒的打破,这个问题在宏观文学史意识中早已淡化了。即使要细究,不少历史学著作中都专论文学家与文学发展,文学研究者以之自然而然,如果社会学、考古学、文化人类

学等学科纳入文学,又何尝不可,何损文学的学科主体性、学术自足性呢?今日学术之大、之新,往往由通、由博而生,阐他域以辅文学是好事,反之亦然,其理实不待详辩。

当然,文学社会学是立足文学而借由社会学的摆渡,这与站在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还是有所不同的。前面用了“船到桥头”的比喻,不妨还以“船”来说吧。文学社会学的“船”上应该载有文人、文学作品、文学生活——这是一艘由文献与文心构建的“文学之舟”。研究它与历史、时代、社会、阶层、制度、家族、社群、城市、地理等的关系,犹如讨论行船与气候、航道、水流、风力、崖岸、景观之间的影响,这是文学本体与某些客观环境的诠释与对话,其欲抵达的方向是文学史的构成及其发展规律,而不是其他。

不言而喻的是,“文学之舟”要航行到目标,需要的动力因素很多,文学社会学只是多种研究方法之一,是研究合力的组成部分,尽管立足于文学,仍不免有偏至性。这种偏至性决定了它能够解决的只是部分问题,而不可能是全部;对文学史的构成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起侧翼支持或补充作用,而不能替代他翼之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将文学社会学既作为明清诗文研究关涉的“问题”,同时看作进行探索的一个“视角”。

近二三十年,形成了“方法论”译介和运用的热潮,其中的得失正在受到检验。在各种引介“方法”中,文学社会学其实大可旁于其外而自成林苑,它底下有深厚的中华民族思维和传统文学批评的土壤。所以,虽然它多少带有一些舶来色彩,我更愿意认为它属于本土话语。

(本文为作者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著《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的自序。)